

On est a recu  
que dans l'Empire de la Chine  
les Villes qualifiées du titre de Fou  
ont été écrites en lettres Romaines, et  
celles de Tchou en Italique.  
On a réglé les Vies ou Villes du 3<sup>e</sup> Ordre,  
et comme il étoit néanmoins à propos  
d'insinuer certains lieux de remarque  
qui ne sont point Tchou  
on les a distingués par une position  
particulière et ovale.

# 地圖小世界 世界大地圖

## 本院新近受贈古地圖簡介

／劉錚雲

九十二年七月十七日至十月十二日、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九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本院「天子之寶」特展先後在德國柏林老博物館與波昂聯邦展覽廳兩地展出，四百組件文物遠渡重洋，展現在歐洲觀眾面前；當地人士反應熱烈，兩地有近三十萬參觀人次。不少人是一次又一次前往欣賞，家住波昂的日裔德籍飯塚一教授就去看了三次，感動之餘，決定將其收藏多年的三十三張歐洲人繪製的古地圖及康熙畫像與北京觀象臺二張古書插圖贈送本院。日前已完成這些圖幅的受贈手續，正式入藏本院。本文特簡要說明這些古地圖，以方便讀者進一步利用這批資料。不過，在未進入主題以前，讓我先介紹一下飯塚一教授。

飯塚一教授一九三二年出生於東京，由於父親是醫生，子承父業，他於是在一九五一年考入東京醫學大學，此後分別在德國烏茲堡(Wurtzburgo)大學、麥茲(Mainz)大學、法蘭克

福(Frankfort)大學、柏林(Berlin)大學深造；一九五八年獲麥茲大學醫學碩士學位；一九五九年獲柏林大學醫學博士學位。飯塚教授是一位著名的腦神經外科醫生，目前已退休。飯塚教授頗為健談；本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與國科會駐德科技組組長胡昌智博士一同坐在他滿室書香的小巧客廳裡，聽他娓娓細說醫學以外的經歷，偶爾飯塚夫人



飯塚一教授與夫人合影

也會在旁補充說明。飯塚教授由於成名甚早，所以常有機會到世界各地訪問，甚至當時尚屬封閉的共產國家如阿爾巴尼亞、中國大陸也都去過；當然也來過臺灣。飯塚教授每到一地旅行必定去逛當地的古書店，除了買古書外，還蒐購古地圖。飯塚教授在教學與行醫之餘，還常在雜誌上撰文介紹他在各地的見聞，這些古地圖就成為他文章中的插圖。他曾在一九八五年四月號的《醫生旅行文化雜誌》(Arztliches Reise & Kultur Journal) 上專文介紹臺灣(頁六三—八一)，包括本院(頁七一)。飯塚教授透露他曾二度參觀本院，印象深刻。

飯塚教授贈送本院的地圖製作年代最早的是在十六世紀末，最晚的則在十九世紀末，不過多數是在十七、十八兩個世紀。一般人以為十六世紀末，或說得更確切一點，一五七〇年，也就是亞伯拉罕·奧特利烏斯(Abraham Ortelius, 1528-98)於安特衛普(Antwerp)出版第一版世界地圖集《世界概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的那一年，是歐洲「現代」製圖技術萌芽期的開始。這本世界地圖集是當時首次以一定尺寸發行的地圖集，共收地圖七十幅，先後以七種語文、三十一種版本持續出版到一六一二年。從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奧氏與傑拉德斯·麥卡托(Gerardus Mercator, 1512-94)、約克多斯·洪第烏斯(Jodocus Hondius, 1563-1612)、若安·布勞(Joan Blaeu,

1571-1638)都是當時著名的製圖家，先後製作了許多精美的地圖。荷蘭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也就成為當時的製圖中心。到了十七世紀中葉以後，講究科學性製圖的法國製圖家如尼古拉斯·桑松(Nicolas Sanson, 1600-1667)等開始嶄露頭角，而他們的優勢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下文將提到的唐維爾(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1697-1782)就是十八世紀中葉極富影響力的地圖家。從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隨著海上勢力與商業的擴張，英國成為當時歐洲的製圖重鎮。因此，透過飯塚教授贈送的三十三幅地圖，我們可以略窺近代歐洲地圖製作的發展過程。這三十三張地圖就地域而言可分為三部份：中國、韃靼、亞洲。以下就手邊資料分三部份對這些地圖略作說明；由於初次接觸古地圖，以及個人語文能力的限制，疏漏之處尚祈讀者不吝指教。

### 中國地圖

第一幅歐洲人繪製的〈中國地圖〉(Chinae)就是出現在奧特利烏斯一五八四年版的《世界概觀》一書中。奧氏是根據葡萄牙籍耶穌會士巴布達(Luiz Jorge de Barbuda)《中國新圖》(A New Depiction of China)手稿中所繪的地圖繪製出版。本圖首次將中國長城呈現在歐洲人面前。在以後的七十年間，這幅圖成為中國地



圖一 中華帝國 21.5cm × 16cm

圖的範本，幾乎是所有中國地圖翻刻或繪製的底圖。飯塚教授贈送本院的〈中華帝國〉(Regnum Chinae) 即是法國繪圖家梅特路斯 (Johannes Metellus) 根據此圖製作，收入伯特羅 (Giovanni Botero) 拉丁文版的 *Theatrum Principium Orbis Universi* 一書中，一五九六年於日耳曼科隆地方 (Cologne) 出版。(圖一) 而飯塚教授贈送本院的另外二幅〈中國地圖〉也都是以此圖為藍本，分別由約克多斯·洪第烏斯與梅斯·梅利安 (Matheus Merian, 1593-1650) 於一六〇六及一六五〇年繪製出版。

洪第烏斯是在一五九九年開始發展他的地圖事業，一六〇四年買下麥卡托地圖集的銅版塊，一六〇六年加大圖幅仍以麥卡托之名出版，而自己則掛名出版人，成為日後所謂的麥卡托、洪第烏斯地圖系列 (Mercator/Hondius series)。不過，飯塚教授所贈並非原件，只是現代的複製品。(圖二) 從圖二可以看到，不見於奧氏圖集的韓國，以島嶼形式出現；同時日本的形狀也與奧氏圖集不同，顯然是根據奧氏二五九五年版《世界概觀》新加入的日本地圖而做了修改。一六三五年洪第烏斯的女婿楊·楊松 (Jan Jansson, 1588-1664) 又對此圖作了若干修改，如中國的東海岸線略呈曲線，日本島嶼的排列也不是先前的百分之百東西走向。一六五〇年梅利安複製此圖出版，飯塚教授所贈應該即為此圖。(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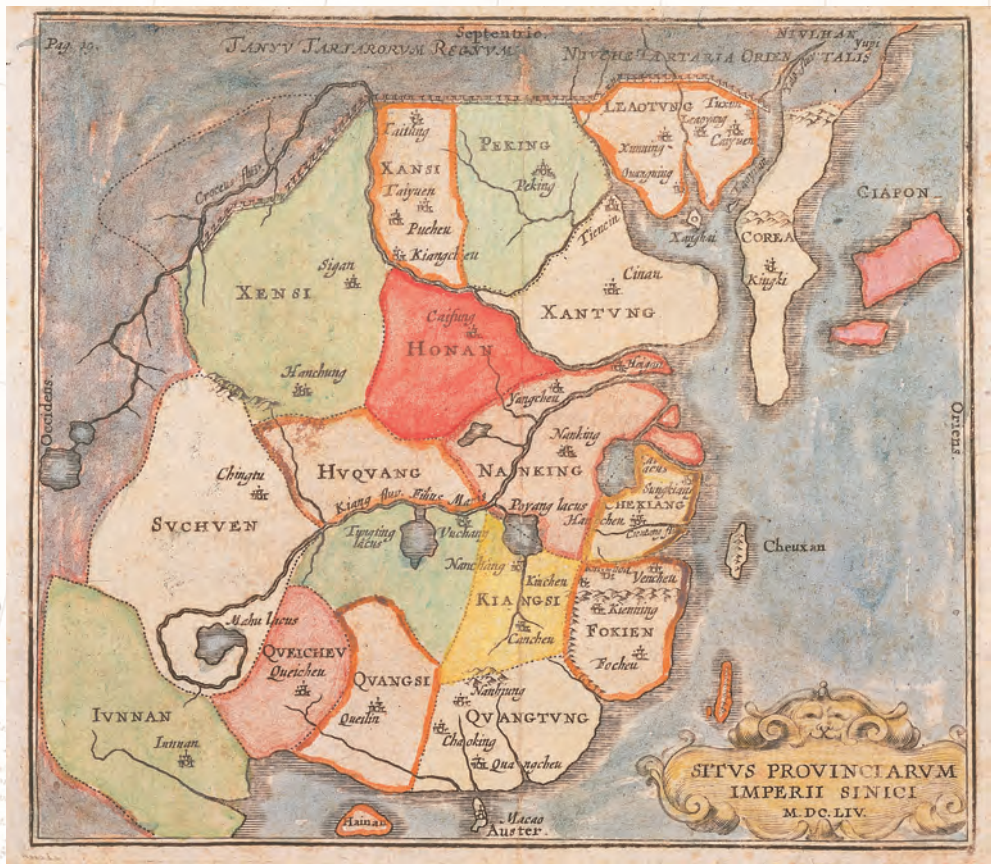
圖二 中國地圖 33cm × 24cm



圖三 中國地圖 35.5cm × 28cm

一六五五年，第一本中國地圖集——《中國新地圖集》(Novus Atlas Siniensis)——在歐洲出版，收入若安·布勞出版的世界地圖集系列 (Atlas Novus) 第六冊。這本地圖集是由衛匡國 (Martino Martini, 1614-61) 繪製的。衛氏是義大利籍的耶穌會士，一六四三年經澳門到中國傳教，一六五一年三月，奉派回歐洲向教

廷申訴，以化解耶穌會允許中國教徒祭拜祖先所引起的「禮儀之爭」；途中被荷蘭人拘禁在爪哇，長達一年多，一六五三年八月抵達荷蘭阿姆斯特丹。次年，在當地出版《韃靼戰紀》(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描寫記憶中親眼所見清軍入關與南下的情形。(此書中譯，見《清代西人見聞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圖四 中國省分圖 16.5cm × 14.5cm

社，1985，頁168。）衛氏的《中國新地圖集》共有圖十七幅，除了中國全圖與日本全圖外，另有明代南、北直隸與浙江、福建、河南、湖廣、雲南、江西、廣西、廣東、貴州、四川、山西、山東、陝西等十三省的地圖。這是他根據明人羅洪先的《廣輿圖》及明人方志、輿地資料繪製而成。除了地圖外，此書尚有一百七十五頁的文字，以省為單位詳細描述當時中國的地理概況，因此有人說他是「中國地理知識之父」。飯塚教授贈送本院的一幅彩繪〈中國省分圖〉(Situs Provinciarum Imperii Sinici) (圖四) 就是這本地圖集中〈中華帝國新圖〉(Imperii Sinarum Nova Descriptio) 的簡圖，收入《韃靼戰紀》，而〈中華帝國新圖〉也就取代奧特利烏斯的〈中國〉一圖，成為此後八十年中國地圖的範本。在飯塚教授贈與本院的中國地圖中，雖然沒有布勞出版的這幅地圖，但是有一幅縮小版的〈中華帝國新圖〉，可能是克魯(Claver, 生平、名諱不詳)於一六七二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圖五)而另兩幅則明顯是以〈中華帝國新圖〉為藍本繪製而成；一是〈中華帝國十五分省圖〉(Imperium Sincicum Quindcupartitum) (圖六)，一是〈中華帝國地圖〉(Imperium Sincicum Sinis Talmim 1590)。(圖七)〈中華帝國十五分省圖〉首見於德國籍耶穌會士基爾賀(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一六六七年於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國



圖五 中華帝國新圖 12.5cm × 12cm

誌》(China Monumentis)一書中。基爾賀多才多藝，可說是一位通人，既研究自然現象，又關懷人文課題；他不僅是中國專家，也通曉埃及事務；不過，他發明幻燈 (magic lantern)，也就是今日幻燈機的前身，則是讓人至今仍津津樂道的。〈中華帝國地圖〉應該也是書中的附圖，目前尚未查到出於何書，以及是何人所製。



圖六 中華帝國十五分省圖 45.5cm × 34.5cm



圖七 中華帝國地圖 16.5cm × 18cm



圖八 中華帝國地圖 19 × 24.5cm

就在布勞這本《中國新地圖集》出版的前三年，也就是一六五二年，布勞製圖事業的強勁對手，尼古拉斯·桑松在巴黎出版了一本《亞洲地圖集》(L'Asie)，其中的一幅〈中華帝國地圖〉(Royaume de la Chine)也在飯塚教授贈與本院的地圖中。(圖八)桑松製作的這幅地圖也是以《廣輿圖》為根據，它是經由另一位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

1607)譯注，於十六世紀末(一五九〇)自中國帶回羅馬的。桑松製作的地圖清晰、明朗，不像荷蘭的製圖家那麼重視地圖上的裝飾，是法蘭西製圖學派(French school)的奠基人；這種不尚華麗而重實用的製圖風格後來影響歐洲製圖業直到十八世紀末葉，而法國也取代荷蘭等低地國成為地圖生產中心。

到了十八世紀，來華耶穌會士又進一步提高歐洲中國地圖製作的水準。康熙四十七年



圖九 中華韃靼及西藏全圖 69cm × 48cm

(一七〇八)，康熙皇帝委請耶穌會士雷孝思 (Jean-Baptiste Regis, 1663-1738)、馮秉正 (Joseph-Marrie-Anne 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德瑪諾 (Romain Hinderer, 1668-1744)、杜德美 (Pierra Jartoux, 1668-1720)、白晉 (Joachim Bouvet, 1656-1730)、費隱 (Ehnenbert Xavier Fridelli, 1673-1743) 等分赴各省，包括台灣，實地測量，繪製成圖；康熙五十六年 (一七一七) 大功告成，定名為《皇輿全覽圖》，並由馬國賢 (Matteo Ripa, 1682-1746) 鑄刻銅版製圖。這部圖集的印本後來被帶到巴黎，法國地圖學家唐維爾 (Jean Baptiste Bouguignon d'Anville) 據以增補，先是於一七三五年伴隨耶穌會士杜赫德 (Pere J. B. du Halde) 《中華帝國地理、歷史、年表、物理》(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Chronolog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一書出版，二年后 (一七三七) 又以《中國、韃靼與西藏新地圖集》(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 為名出版。由於是以實測的中國地圖為藍本，資料精確，而唐維爾又極富研究精神，製圖嚴謹，這些地圖資料出版後廣受注意，很快就取代《中國新地圖集》成為十八世紀歐洲製作中國地圖的範本。飯塚教授贈送本院的〈中華韃靼及西藏全圖〉(Carte la plus generale et qui comprend la Chine,

Division de l'Asie

On est averti  
que dans l'Étendue de la Chine  
les Villes qualifiées du titre de You  
ont été écrites en lettres Romaines, et  
celles de Tchou en Italique.  
On a négligé les Villes du 3<sup>e</sup> Ordre,  
et comme il étoit néanmoins à propos  
d'insinuer certains lieux de remarque  
qui ne sont point Tchou  
on les a distingués par une position  
particulière et avérée.



圖一〇 中華韃靼地圖 79cm × 51.5cm

華韃靼地圖》(Carte general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圖一〇) 即出於上述二書。唐維爾  
隨後又陸續製作了大幅單張或多張成套的義大  
利、非洲、亞洲、印度與世界地圖。其中亞洲



圖一一 西伯利亞與韃靼圖 108cm × 52cm

圖自一七五二至五三年分年出版亞洲部份地區  
的地圖。飯塚教授送給本院該圖的第二部份，  
即《西伯利亞與韃靼圖》(Carte... la Sibirie...  
de la Tartarie)。(圖一一) 另一方面，馮秉正  
帶回的資料也頗受重視，他的十三冊《中國通



圖一二 中國地圖 45cm × 42.5cm



圖一三 韃靼中國地圖 50.5cm × 41cm

史》(Historie Generale de la Chine) 也在去世三十年後分九年(一七七七一—一七八五)出版，圖一二的〈中國地圖〉(Carte de la Chine)就是他書中的插圖；而另兩幅同以〈韃靼中國地圖〉(Cart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為名的韃

靼圖也明示是根據他的資料繪成；(圖一二、圖一四)而〈福爾摩莎島圖〉(Die Insel Formosa)則表明是「奉康熙帝的新測量」。(圖一五)

進入十九世紀，地圖的製作益趨精確。即

Division de l'Asie

On est averti  
que dans l'Empire de la Chine  
les Villes qualifiées du titre de Fou  
ont été écrites en lettres Romaines, et  
celles de Tchou en Italique.  
On a négligé les Villes du 3<sup>e</sup> Ordre,  
et comme il étoit néanmoins à propos  
d'insinuer certains lieux de remarque  
qui ne sont point Tchou  
on les a distingués par une position  
Pec.



圖一四 韃靼中國地圖 49.5cm × 42cm

使不是專家也可以看出〈中華帝國地圖〉(The Chinese Empire) 較先前所介紹的任何中國地圖都來得精細。(圖一六) 這張圖是美國新教牧師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84) 所編, 一八八二年出版。衛三畏於一八三三年前往中國傳教, 一八七六年回到美國, 次年, 進入耶魯大學, 擔任中國語文與文學教授。

### 韃靼地圖

「韃靼」(Tartary, Tartarie) 作為地理名詞, 泛指烏拉山 (Ural mountains) 以東至太平洋的廣大亞洲地區, 北界西伯利亞, 南鄰伊朗、克什米爾、西藏、中國等地。今日除了見於古地圖外, 已很少人使用。除了上面提到的

「韃靼」(Tartary, Tartarie) 作為地理名詞, 泛指烏拉山 (Ural mountains) 以東至太平洋的廣大亞洲地區, 北界西伯利亞, 南鄰伊朗、克什米爾、西藏、中國等地。今日除了見於古地圖外, 已很少人使用。除了上面提到的



圖一五 福爾摩沙島圖 23cm × 19cm



圖一六 中華帝國地圖 59cm × 44.5cm

五幅外，飯塚教授還送本院八幅有關韃靼的地圖。這些地圖都是十七、十八世紀初出版的。最早的一幅是麥卡托、洪第烏斯的〈韃靼地圖〉(Tartaria)。這幅圖應該是根據麥卡托一五六九年的那張有名的〈世界地圖〉為底本，另外參考了探險家白勒特 (Willem Barents) 的探險資料而繪成，收入於洪氏編輯出版的《小地圖集》



圖一七 韃靼地圖 19cm × 14cm

(*Atlas Minor*) 中，而出版時間是在一六〇七與一六二二年之間。(圖一七) 時間次晚的是日耳曼籍耶穌會士韓內士·薛爾 (Heinrich Scherer, 1628-1704) 的〈韃靼亞洲新圖〉(*Totius Tartariae Asiaticae Nova Descriptio*)，收入他於一七〇〇年在慕尼黑 (Munich) 出版的《新地圖集》(*Atlas Novus*) 中。(圖一八)

• Division de l'Asie

On est a veu  
que dans l'Empire de la Chine  
les Villes qualifiees du titre de Fou  
ont été écrites en lettre Romane, et  
celles de Tchou en Italique.  
On a negligé les Villes du 3. Ordre,  
et comme il doit néanmoins s'propres  
d'indiquer certains lieux de remarque  
qui ne sont point Tchou  
on les a distingués par une position  
particuliere et cercle.



圖一八 韃靼亞洲新圖 36.5cm × 25cm



圖一九 盧布魯丘蒙古旅程圖 23cm × 16cm

地圖除了記錄地形地貌外，也記錄旅人或探險家的路程。飯塚教授送給本院三幅這樣的地圖，其中二幅與韃靼地區有關，另一幅則為亞洲全圖。這三幅都由彼得·范德阿（Pieter

van der Aa, 1659-1733）繪製。范德阿九歲入書店當學徒，二十一歲建立自己的出版事業。他於一七〇六至一七八年間出版了一系列有關使者或探險家旅程的書，這三幅地圖，都是其

中的附圖，分別記錄卡庇里尼（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 c. 1180-1252）於一二四五年及盧布魯丘（William Rubruquis, c. 1215-70）於



圖二〇 馬可孛羅父子亞洲旅程圖 30.5cm × 20cm

一二五三年出訪蒙古的路程，（圖一九）以及威尼人馬可孛羅父子旅行亞洲的旅程圖。（圖二〇）

### 亞洲地圖

第一張歐洲人印製的亞洲地圖見於日耳曼籍製圖家孟斯特（Sebastian Munster, 1489-1552）一五三八年編輯出版拉丁文法學者余利奈斯（Gaius Julius Solinus）的一本著作中。余利奈斯是活躍於三世紀前半的學者，孟氏在編輯這本書時，放進許多地圖。這幅亞洲圖後來又被收入他編印的托勒密（Ptolemy）《地理學》（*Geographia*）與自己編寫的《宇宙志》（*Cosmographia Universalis*）中。他的《宇宙志》分成德文、拉丁文、義大利文、法文等四種語文出版，德文版自一五四四年首次發行後，即不斷更新出版，甚至在他本人於一五五二年過世後，仍持續出版到一六二八年。在一五八八年版的《宇宙志》中，所有舊圖，包括這張亞洲全圖，都為奧特利烏斯《世界概觀》一書中的新圖所取代，但所有圖版都是以木刻模仿原圖銅版鐫刻線條的方式刊出。或許是這個緣故，有人將奧氏書中的〈亞洲新圖〉（*Asia Nova Descriptio*）誤為世界首張亞洲地圖。飯塚教授就是送給本院這麼一張一五八八年版《宇宙志》一書中的〈亞洲全圖〉，也就是奧氏



圖二一 亞洲新圖 36cm × 32.5cm

《世界概觀》中的〈亞洲新圖〉。(圖二一)

這張亞洲全圖或許不是世界第一張亞洲圖，但卻是第一張以「福爾摩沙」(Fermosa)標示臺灣的亞洲圖。有人指出這是奧特利烏斯的貢獻，因為他根據的底圖——麥卡托於一五六九年出版的一幅世界地圖上面並沒有Fermosa的標示。飯塚教授沒有贈送本院這幅麥卡托的世界地圖，但有二幅他送的地圖應該是以它為藍本的：一是洪第烏斯的〈亞洲地圖〉(Asia)，一六〇七年收入其《小地圖集》出版。(圖二二) 一是見於一六〇八年版的托勒密《地理學》中的〈東印度地圖〉(India Orientalis)。(圖二三) 我們在這兩幅圖上的確都沒有找到Fermosa的字樣。不過，洪氏一六〇六年出版的〈中國地圖〉上卻有Fermosa字樣。洪氏的中國地圖資料雖然取自奧氏的一五八四年的《世界概觀》一書，但他在製作亞洲地圖時，顯然忽略了奧氏對中國地圖資料的小小改進。

其實，大多數的製圖家對地區性資料的變動還是相當注意的。即使我們僅就中國來看，也不難從飯塚教授贈送本院的亞洲地圖中看到其中的變化。首先，除了上面提到的二幅亞洲地圖外，克里斯朵夫·伯格(Christoph Weigel, 1654-1725)於二七二二出版的〈古亞洲地圖〉(Asia Vetus)(圖二四)可能也仍然沿襲一六五



圖二二 亞洲地圖 19.5cm × 15cm

五年以前的中國地圖資料。不過，他兒子約翰·伯格（Johann Weigel, ?-1746）與Adam F. Zuerer於一七二九年出版的地圖就有了改變。就中國部份而言，很明顯的是以一六五五年衛匡國的中國全圖為底本。（圖二五）彼得·杜



圖二三 東印度地圖 29cm × 20cm

瓦（Pierre Duval, 1619-83）一六八六年的〈亞洲全圖〉（L'Asie）顯然也沒有超越〈廣輿圖〉的系統，（圖二六）但是他的中國東海岸線的輪廓明顯與伯格的不同。這是因為杜瓦另有來源。他是桑松的女婿（一說外甥），他的中國

Division de l'Asie

On est a veu  
que dans l'Empire de la Chine  
les Villes qualifiees du titre de Fou  
ont été écrites en lettre Romane, et  
celles de Tchou en Indique.  
On a peigné les Vies ou Villes du 3<sup>e</sup> Ordre,  
et comme il étoit néanmoins à propos  
d'insinuer certains lieux de remarque  
qui ne sont point Tchou  
on les a distingués par une position  
particulière et ovale.



圖二四 古亞洲地圖 40.5cm × 32cm



圖二五 中國全圖 16.5cm × 11.5cm

部份因而是以丈人的〈中華帝國地圖〉為基礎，而〈中華帝國地圖〉所根據的是羅明堅帶回的資料，與衛匡國的不同。  
到了一七四四年，約翰·哈斯（Johann Mathias Haas, 1684-c.1742）的〈亞洲全圖〉（Asia）與伯格的〈古亞洲圖〉又有所不同。（圖二七）依據圖上的文字，本圖是哈斯根據

當代旅行者的見聞與古代文獻的記載所收集的資料，請繪圖家繪製 Gottlob Boehm 而成。顯然，哈斯也參考了唐維爾的中國地圖而繪成此圖，因為無論輪廓與內容都與先前的亞洲圖有明顯的差異，而在中國部份與唐維爾的地圖極為近似。



圖二六 亞洲全圖 19cm × 14cm

### 結語

地圖是人類對所處人文、自然環境的描繪或記錄。透過線條、符號，一地的山川、聚落、城市、交通分佈歷歷在目，不但是空間訊息的表達，也是對自身與他國環境瞭解程度的表徵。經由飯塚教授所贈送的三十三幅地圖，我們清楚看到，藉由耶穌會士的地圖，歐洲人



圖二七 亞洲全圖 53cm × 48.5cm

對中國地理環境的認識由陌生而瞭解，而我們對於歐洲製圖技術的發展也有初步的認識。飯塚教授的這批地圖在某種程度上也像當年的耶穌會士一樣，扮演訊息傳播的角色，希望這批地圖的入藏本院可以開啓我們對中外地圖比較研究的契機。

※本文寫作承史美德教授、陳玉秀小姐、陸仲雁女士、陳鳳儀小姐協助，特此致謝。

